

DONG FANG BO WU

东方博物

浙江省博物馆 编



浙江大学出版社

37.704253
Z385/4
0036165

DONG FANG BO WU

东方博物

浙江省博物馆 编

第四辑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博物(第四辑)/浙江省博物馆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11
ISBN 7-308-02210-2

I. 东… II. 浙… III. ①博物馆事业-研究-中国-文集
②文物-研究-中国-文集③史学-研究-中国-文集 IV.G26
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5970 号

东 方 博 物

(第四辑)

浙江省博物馆 编

*

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玉古路 20 号,邮编 310027)

(E-mail:zupress@mail.hz.zj.cn)

*

浙江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部排版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16 印张 17.5 字数 420 千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1100

ISBN 7-308-02210-2/G·284

定 价:50.00 元

2000.2.3

《东方博物》编辑部

No. 0316789

本书编辑委员会

主任：俞剑咏

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宏理	李文采	李刚	汪济英
周贵泉	周新华	查永玲	俞为洁
俞剑咏	黄涌泉	曹锦炎	鲍复兴

主编：曹锦炎

编辑部主任：周新华

编辑：沈琼华

F 617 15

序

俞 剑 咏

1999 年的 10 月,是个不寻常的时刻。共和国喜逢 50 华诞,澳门也即将回归祖国。而在此同时,已走过几十年风雨历程的浙江省博物馆也迎来了她建馆 70 周年的纪念日。《东方博物》第四辑在这个特殊的时刻面世,也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

浙江省博物馆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始建于 20 年代的地方性以历史为主的人文科学博物馆,在历史上曾经创造过许多辉煌。从 30 年代的良渚文化遗址发现和试掘起,到 70 年代震惊世界的河姆渡文化的发掘,以及上林湖唐代越窑、龙泉窑和南宋官窑遗址的调查发掘,浙江省博物馆曾为浙江历史文化的研究作出过卓越的贡献。80 年代初,原考古部和自然部因事业发展需要先后析出成立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浙江自然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的功能转变为专门从事陈列展览、文物保护和科学研究所。

进入 90 年代,浙江省博物馆的事业得到了更加迅猛的发展。原有的老馆舍也进行了改建、扩建,新馆舍以独特的“馆中园、园中馆”的格局,成为杭州一处新的文化景点。在陈列展览方面,浙江省博物馆也大胆开拓思路,对原有的固定陈列进行调整和改造,同时不断引进丰富多彩的临时展览,使博物馆越来越受到大众的欢迎,《浙江日报》在 1996 年头版头条刊出《展览变静为动,服务由等到请,浙江省博物馆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大学》的记者文章,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此外,文物征集、文物保护工作也取得很大成绩,其中,通过社会力量的资助,成功地从香港抢救回流散的越王古剑,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

与此同时,浙江省博物馆的研究出版和对外文化交流工作亦并行不悖,先后成功举办了多次高档次的学术研讨会和出国文展,创办的大型学术刊物《东方博物》迄今已出版四辑,不仅填补了本省文物考古类综合性学刊的空白,为本省和海内外文物考古工作者开拓了一块新的学术园地,而且在海内外学术界已有了一定反响。可以说已经形成一定的气候,只要假以时日,一定会有更大的收获。

在回顾往事的时候,我们要对为浙江省博物馆的事业发展作出过贡献的工作人员表示崇高的敬意,对一直以来关心支持博物馆事业的领导、专家和海内外朋友表示诚挚的感谢。

时光即将进入 21 世纪,在新的时期、新的机遇到来的时候,可以预见博物馆事业必将进入到一个更加光辉灿烂的新的境界。我相信,有党的文物工作路线的指引,通过浙江省博物馆全体研究人员和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浙江省博物馆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1999 年 10 月 19 日

目 录

序	俞剑咏(1)
从新资料追踪先代耆老的“重言”	
儒道学脉试论	饶宗颐(1)
望山楚简文字新释(四则)	曹锦炎(4)
𠂔和𠂎的新试读	
太平洋两岸古祭祀符号比较	[美]许 辉(7)
浙江省五十年来史前考古的主要收获	王明达(11)
二论萧山跨湖桥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王海明(19)
关于璧琮功能的考古学观察	
良渚古玉研究之一	牟永抗(29)
关于研究良渚文化的几点思考	芮国耀(39)
良渚玉带钩刍议	赵 畔(45)
汉化中的“越王城”与越化中的楚汉墓:秦汉东南民族变迁模式举隅	吴春明(51)
也谈修内司官窑	陈元甫(59)
越窑综论	李 刚(64)
福建古代陶瓷与日本茶道具	栗建安(75)
腊卡陶瓷与中国青花瓷	袁南征(83)
上林湖地区的青瓷分期	谢纯龙(88)
杭州地区古窑址调查概况与认识	姚桂芳(108)
浙江古代外销瓷初探	蔡小辉(120)
河姆渡遗址试掘漫忆	汪济英(131)
甲骨文非书法辩	王宏理(136)
时代精神与书法时代风格	李文采(140)
黄宾虹花鸟画之分析	查永玲(149)
任伯年绘画作品赏析	王小红(153)

璣·璲考辨	周 刃(156)
略谈两枚与中日关系史有关的铜镜	王 牧(163)
试述隋唐官印之特征及相关问题	周其忠(168)
关于吴越国王投简中的“射的”	竺家惠(173)
试论铜锣与铜鼓的关系	吴晓秋(175)
说开裆裤	梁白泉(179)
“买东西”续考	陈 江(186)
中国古代非流通钱币称谓考析	许小玲(207)
关于浙东抗币辅币的几点看法	尹 铁(210)
妈祖系疍民考	郭志超(214)
孙诒让与玉海楼藏书	杨渭生(216)
吴承恩、归有光在长兴县	夏星南(226)
河姆渡饱水木质文物的干缩机理及其定型	郑幼明(232)
关于现行博物馆定义的札记	严建强(239)
试论当代博物馆的大众化问题	蔡 琴(246)
湖州黄梅山原始瓷窑址调查简报	潘林荣(249)
温州地区瓷窑址的考古调查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温州市文物管理处(255)

Main Contents

Trace the “Emphatic Words” of the Elders of the Ancient Times from New Data

— a Trial Discussion on the Evolution of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Z. Y. Rao

A New Explanation to the Writings in *Wangshang Bamboo Scripts of*

the Chu Time (4pieces) J. Y. Cao

Main Achievements on the 50 years’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of Zhejiang ... M. D. Wang

A Second Discussion on the Remains of the New Stone Age in the

Kuahu Bridge, Xiaoshan H. M. Wang

Archaeological Observation on the Functions of Jade *Bi* and *Cong* Y. K. Mou

Thoughts on *Liangzhu Culture Study* G. Y. Rui

An Elementary View on *Liangzhu Jade Belt* Y. Zhao

On *Xiuneisi Kiln* Y. P. Chen

Antique Fujian Porcelain Wears and Japan Tea-rite Wears J. A. Li

Laka Porcelain Wears and Blue-and-White Porcelain N. Zh. Yuan

Periods of the Blue Porcelain of the Shanglinhu Area Ch. L. Xie

Survey and Understanding of Investigation of Ancient Kiln Relics

in the Hangzhou Area G. F. Yao

A Casual Review of the Trial Excavation of the *Hemudu* Ruins J. Y. Wang

A Debate on “*Jiaguwen* Is Not Calligraphy” H. L. Wang

Spirits and Calligraphy Styles of an Age W. C. Li

Analyses on *Huang BinHong’s Flower-and-bird paintings* Y. L. Zha

On Children’s Open-seat Pants B. Q. Liang

A Continuation Study on “*Maidongxi*” J. Chen

A Research on the proposition that *Mazu Was A Xumin* Zh. Ch. Guo

Sun Yirang and the Book Collection of *Yuhai Pavilion* W. Sh. Yang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of the Porcelain Kiln Relics in the Wenzhou Area
Zhejiang Antique and Archaeology Institute & Wenzhou Antique Management Office

(Translated by Shao lan)

从新资料追踪先代耆老的“重言”

——儒道学脉试论

饶宗颐

中国文化自 19 世纪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卷起洋务运动的热潮,对自己旧文化的真义,完全失去了信心。20 世纪的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科学两个要素,于是有所谓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不同主张的争论,影响至于今时尚未完全结束。近半世纪以来,由于考古学的发展,地下的宝物,陆续出土,简帛上先秦经典的早期写本大量面世,使人们对古文献记录的可信性大大增加。许多佚籍的出现,开拓古代学术史的新视野,使人们对古书形成的书写及编纂的过程有新颖的认识。

20 世纪末期以来,出土文献已知道的有湖北地区的楚简、西北敦煌附近悬泉驿的汉简和长沙的吴简,这些宝贵的遗产,目前正在整理进行之中,预计要到 21 世纪初期,方能够完全公布。所以我说 21 世纪应该是一个极重要的古籍经典整理的新世纪。历史上只有西晋太康时期的汲冢遗书可相比拟,大量佚书的出现成为史无前例的巨大收获。这些出土文献需要我们花一个长时间好好去整理、研究。我们很需要有一支工作队伍,才能像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参与中秘认真地去完成古书整理(校讎)的任务。

近期公布的湖北荆门郭店的楚简,引起世界学人的瞩目。在北京甚至有人说道:“对国际汉学界而言,九八之夏,‘热’的不是世界杯,而是郭店楚简。”(《书品》1998 年第 4 期)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郭店楚简》所披露出土的经典新资料,有三项重要的内容:第一是最早属于战国时期的《老子》写本;第二是《礼记》里面的《缁衣》全文,以前被认为是汉代作品,现在应该提前了;第三是一些后来全未见过的儒家佚书和零星断片格言型的句子的记录,整理者给以标题曰“语丛”。证明墓主人是一位儒、道兼通的人物。

这些所谓“语丛”,还没有受到应得的重视。我个人认为这是极有研究价值的崭新经典文献,这即《庄子·寓言篇》所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的“重言”。庄子说明他立言的体例,有寓言、重言、卮言三类,十分之九是譬喻式的寓言,又有他自己发挥、曼衍其词的卮言,尚有十分之七则是“重言”。什么是“重言”呢?庄生说:

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来者)者,是非先也。

“重言”是为人所(尊)重之言,是先前老辈(耆艾)所说的话,为一般人所尊重而具有“经纬本末”作用的格言。虽然它的年代在前,如果没有经纬本末的意义,可以期待来者去发扬的,便不足以“先”。照这样看来,“重言”是足为后世师法、永远为人所尊重的名言。(杨守敬据日本高山寺的《庄子》写本“年耆”二字旁各有二点,认为“年耆”二字是“来者”的误抄。)因此,楚简《语丛》所抄写的东西,很可能就是墓主人随手摘记的先代耆艾的重言。

先代的重言，大部分是庄子依据之来著论的。《庄子》外篇有《胠箧》（第十）。司马迁说他“作漁父、盜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江陵张家山一三六号（汉文帝时）墓中有《盜跖》竹简，跖字写作“蹠”。《盜跖》一向被认为是赝品，但汉初已为人所诵习。马其昶《庄子故》引王安石说：“此篇之赝，不攻自破”，可知其不然。司马迁亦亲见其书，言自可信。今郭店简《语丛》中出现下列文字：

數（窃）鉤者或（誅），數（窃）邦者為者（諸）侯，者（諸）侯之門，義士之所薦（存）。

（《语丛》4.9）

简上文字，清晰可辨。《史记·游侠传》引此称：“窃钩者誅，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庄子·胠箧》篇云“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有一段论盜跖“被窃钩者誅，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是非窃仁义圣知邪？”由《语丛》所记，知此数句乃战国以来楚人流行之重言，庄子作《胠箧》时借用之，并不是他自己所写的东西。

《语丛》中有分明见于《论语》的，如：

志于衍（道），虞（据）于惠（德），厭（依）于惠（仁），游于覩（艺）。 （《语丛》3.50,51）

以上诸句，见《论语·述而》上引子曰。分明出于孔子。可是《语丛》没有指出它的来历出自孔子之语。可能是战国时视为重言而引述之。另一条记著：

亡（毋）啻（意），亡（毋）古（固）。 （《语丛》3.64 上）

亡（毋）义（我），亡/亡勿（物）不勿（物）。 （《语丛》3.64 下）

曇（皆）至安（焉）。 （《语丛》3.65 下）

《论语·子罕》：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与此数句相同，而序次则作意、古、我、必。借“义”字为“我”。《说文》：“义，己之威仪也。”字从我从羊。又读古为“固”。增益两句，“亡物不物”及“皆至焉”加以引申，亡物不物者，似是杂用庄子“物物而不物于物”之义，既采《论语》作为重言，复取庄子解释之，分明是儒、道兼用。

韩愈《论语笔解》说：“此非仲尼自言，乃弟子记师行事。”“子绝四”一句，自来注家有许多争论，有说孔子自无此四者，一说只有绝二而已。今看楚简，并不言出自孔子，亦无“绝四”二字，只是视为前人的重言。这亦可能原本是古先的重言，而儒家采用它。

《语丛》中又有略同于老子的，例如：

凡勿（物）繇（由）皇（亡=无）生。 （《语丛》1.1）

这即老子所谓“万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马王堆乙本《德经》第41章）

多毋（好）者，亡毋（好）者也。 （《语丛》1.89）

老子所云“善者不多，多者不善”（同上，第68章），“甚爱必大费”（第44章），意思正相似，即“去甚去泰去奢”之旨。

限于篇幅，止举出一些例子，说明先秦流行的先辈的重言为儒、道诸子所承袭采用。

冯友兰在《新理学》开头就说：“本书是‘接著’宋明以来理学讲底，而不是‘照著’讲底。”其实先秦各家，“接著讲”和“照著讲”二者都有之，很不容易分别得清楚。庄子自称“重言十七”，他坦白承认许多是“照著讲”底。《淮南子》说：“世俗之人多尊古。”（《修务训》）故记古以自重。至于“接著讲”，承“先代之流”，后浪推前浪，自然如此，是不用多说的。

“重言”的重要，吕不韦因之设“重言”一章来讨论。葛洪《抱朴子·外篇》亦著“重言”篇，指出“希声而会大音，约说以俟识者”。重言每每用极简括的语句，去表达深远的含义，省其辞而约其旨，不管细事，以免多费唇舌。所谓“敬其辞令”，是古人立言的要诀。

《语丛》一大堆材料的出现，对于分辨儒、道思想脉络、源流有极大的帮助。这些古代重言，零玑碎璧，正待去好好利用，以便于对古代思想脉络寻求“一点”新的认识。

郭店楚简中有一篇《性自命出》，精义纷披，很需要作深入研究。令人想起当年傅孟真著《性命古训辨证》，欲用语言学方法，否定阮元之说，可惜此文尚未出土。传说当否，已有杨向奎等的评论。这一新资料对我们的启发是十分重要的。

我曾谈到古典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旧义的重新认识与估定，很可能引出一次文艺复兴运动。以欧洲为例，当日通过东方拜占庭带动研究希腊、罗马的古典风气，引起人文主义的一股热潮。从阿拉伯文巨册著作中拾取勾稽，加以重构，非常艰辛；何况摆在我面前就有大量的出土文献，以简牍而论，从先秦到两汉吴晋，数字之巨，令人吃惊。可以依据它去仔细研究，这不是得“天”独厚，而是得“地”独厚，安可辜负它，不加以充分利用！汤因比曾说吾国唐代有儒家带动的文艺复兴，他似乎即指韩愈的古文运动，那只是文章体貌的改革，不能代表文化的意义。这批简牍的整理刊布，还需一段长时间，要到下一世纪方能完成面世，所以我说 21 世纪将是古文献整理的全盛时代，亦即是古典文化重新评估、振兴的时代；可能带来的自家文艺复兴运动，代替上一世纪的受西方冲击下的新文化运动，这应算是一种进步的文献学工程，更富有学术意义。

许多人喜欢别出心裁，重视创见，不肯去“接着讲”。其实文化是一长流，没有间断。洋务运动以后，提倡西化，无异要把它切断。然而“抽刀断水水更流”，时到今日，仍旧要接着去讲。回归到炎黄的文化，西来的东西，只是旁流的汇集，并没有把主流放弃掉。我的讲法是下面的方式：



这样发展下去，文化前途长远而壮大的局面，相信是无可限量的。这一大堆新材料，如果我们不去努力，西方学人就会越俎代庖，代替我们工作的。

大家都知道，人文与科技，二者应该并重，不能偏废。香港在倡导科技之余，如能够同时亦参与这一项人文工作，以港地的人才之众，经济力量之雄厚，给予支持，成就必大有可观。如能实现，那时的香港亦不难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了。

望山楚简文字新释(四则)

曹 锦 炎

60年代出土的江陵望山楚简，经过朱德熙等先生的考释，已经做了很好的释文^①，给古文字研究者提供了释读楚简文字的一个范本。近年来，包山^②、郭店楚简^③材料的公布，使我们对楚简文字有了新的认识。利用新出楚简来订正旧有的释读，很有必要。最近，笔者对望山楚简文字重新梳理，时有所获，今选其若干，以求正于同好。

絹 肀 结

望山二号墓楚简8号云：“生结之里”，《望山》谓：“‘生结’亦见25号简，‘结’疑当读为‘纤’。”《方言》卷二：“縉帛之细者谓之纤。”按此说可商，从望山简遣册结合包山简相关的辞例来看，“结”即“絹”之省形。望山简2号云：“絹紱联缕”，又云“肖紱联缕”；包山简271号：“紱絹之纯”，277号：“二紱絹之僮”，可知望山简的“生结”即包山简的“紱絹”。由望山简的“絹紱”或作“肖紱”，可知“絹”又可省作“肖”。肖字又可单用，如“肖轩反”（2号），“肖黄里”（6号，均见望山简）。因此，絹、结、肖在简文中均指同一种丝织品，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望山》认为“肖紱”读为“縉紱”，是指黑色之紱，没有将其视作丝织品名，是不恰当的。

我认为，“絹”即“絹”字，写作“絹”乃楚文字特有的构形。“絹”，从糸、冒声，“絹”，是以“肖”为声旁。很可能“肖”是以“占”得声的。占、冒二字的古音比较接近，例可通假。由此看来，楚文字是以从占声的“肖”来用作“冒”旁的。正因为“肖”从占声，所以“肖”旁也可以省去“肉”旁而直接写作“占”。

新出郭店楚简亦有从“肖”旁的字，例如《缁衣》篇：“少（小）民亦隹（唯）日憇”（10号简）、“则大臣不憇”（22号简），“憇”字今本均作“怨”。在其他各篇中，虽无今本对照，憇字均应读作“怨”。包山简138号“又（有）憇不可讲（证）”，也是读为“怨”。可见，“憇”是以“肖”即“冒”旁来代替“兜”旁的。冒、兜的古音极相近，怨字写作憇，变换声旁毫不奇怪。更值得注意的是，《缁衣》篇引《诗》“我龟既厭”的“厭”字作猷，亦从肖旁（46号简）。我们知道，西周金文中的厭字作猷，见毛公鼎，而郭店楚简作猷，这正是“肖”即“冒”的极佳证据。由此看来，厭字所从的“冒”乃是由“兜”讹变的。包山简“綯”字，简271作綯，牍则作縗（两处所记为同一内容），所从之口变成从占亦可为旁证。

上面已经指出，絹即絹字，望山简文云“生絹”，而包山简则作“紱絹”。絹有生、熟之分，今仍旧，所以简文的“生絹”当与今指同，则包山简的“紱”字从糸旁乃因沿上下文而衍增。如果望山简的“生”是“紱”之省写，则“紱”是指另外一种丝织品。此外，简文云“絹紱联縢”，是指用絹、紱两种丝织物编结的绳索，《诗·鲁颂·閟宫》：“公车千乘，朱英绿縢。”诗中的“縢”就是

简文中的“联滕”。

附带指出,包山楚简的綈字写作𦗔,郭店楚简的𣎵字写作𣎵、𣎵,“𣎵”所从的占旁口中有饰笔(包山简𣎵字作𣎵,无饰笔),口旁中间趁隙加点(横划)作饰笔,在战国文字中是习见的现象。即以“占”字而言,在望山、包山两处简文中,就有占、占两种构形。所以,《包山》将“綈”隶作“綈”,《郭店》将“𣎵”隶作“𣎵”,均欠妥。

厚

厚字望山简原篆作𠀤、𠀤,《望山》引《说文》篆文作𠀤、古文作𠀤 与此构形相近而释为“厚”,甚是。但分析字形,认为“厚”下部所从的𠀤与𠀤(𧈧)字下部相似,引楚帛书“鞋”所从之𧈧作𠀤、望山一号墓简文“鞋”所从之𧈧作𠀤为证,则不确。楚文字“𧈧”旁构形作𠀤、𠀤,下部乃是篆文的省变,后世隶变作“享”,其与厚字下部隶变后从“子”,乃殊途而同归,其来源本不相同,不能混为一谈。

郭店楚简出土后,“厚”字在简文中出现的频率较高,使我们清楚了它的造字本意。简文中厚字作下列构形:𠀤、𠀤、𠀤、𠀤、𠀤、𠀤,《郭店》已正确隶定作𠂇,从上引构形特别是前三例来看,下部所从确是“毛”,望山简的构形与其他几例相同,已是其省变后的构形。作𠀤,上部“石”旁也有省略。由此可知,厚字本作𠂇,乃是会意字。“厚”与“薄”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用象形的办法很难造出这个字,所以用像毛一样堆积至像石头一样有一定的厚度,来“会意”厚。其构思可谓煞费苦心。小篆作𠀤,𠀤乃𠀤之讹变,𠀤则是用的省变后的形体𠀤之讹变,楷作“子”又有讹变,是将“石”旁的口与下部“毛”之省形合而为一,其演变痕迹还是可以看清楚的。

郭店楚简中,厚字或体作𠀤、𠀤,下部省略了“毛”旁,或加注“句”声,或加注“戈”声,变成了形声字。厚、句、戈古音极相近,所以可以用“戈”或“句”来表示“厚”字的读音。至于《说文》厚字古文作𠀤,应该是𠀤形之讹,但也不排除是“𠀤”即从土、后声的另一种异构的可能性。

綈

《望山》指出,綈字亦见于信阳简 202、207 等号,“秋”旁作𦗔,望山简多简化成𦗔。此说本不误,然包山简出土后,由于简文中作为姓氏的“秋”字构形除了作𦗔(187)、𦗔(47)外,又有作𦗔(49),遂有数位学者相继改释为“穆”,将“綈”亦改释为“繆”,读为“缪”,一时信者甚众。按郭店简中,引“《春秋》”之秋字作𦗔(12.25),同于信阳简。而根据文例,可以证明望山简的𦗔旁即信阳简的𦗔旁。包山简作𦗔者,是其异构。望山简的綈字,也有作𦗔的。郭店简另有秋字构形作𦗔(13.40),正与此相同。郭店楚简也有“穆”字,作𦗔(4.1)𦗔(3.33),两者构形虽有近似之处,但仍有差别,关键在于穆字所从的“𦗔”下有一横画,而秋字则无。有无这一横画是区分楚简中秋、穆两字的界尺。战国古玺中,穆字作𦗔、𦗔,秦简穆字作𦗔³“𦗔”下均有一横画,也可证明这一点。至于仰天湖简 10 号之𦗔,不仅构形与“綈”字略有区

别,而且“”下也有一横画,史树青先生在考释中已释为“繆”,甚是。

附带指出,由于郭店简中有些简的文字写得草率,“秋”字有作^④(15.20)形,“穆”字有作^⑤(5.7)形,乍看似乎无别。仔细分析,秋字左侧下部作三撇,首两撇起笔从右往左下斜出,而穆字左侧下部首笔为横画,行笔自左向右,两者有着明显的不同。

遯 羣

望山一号墓楚简云:“自畱[戶]以羣集岁之畱[戶]”(29+30号),羣字又见简34号,鄂君启节作^⑥,不从辵旁。《望山》认为,此字当作“至”或“经”解。按此字旧说纷纭,均不确,郭店楚简出土后,才明白此字结构上从畜、下从京,即羣,作遯乃其繁构。楚文字的写法系畜、京共用一个偏旁。

羣,即“就”字初文,前人早已释出,朱德熙先生曾撰文加以申论^⑦。1980年陕西出土的史重鼎,铭文引《诗·周颂·敬之》“日就月将”,就字写作遯,可以证明^⑧。郭店楚简《五行》“不悦不羣(就)”(简21),读为“不悦不戚”,^⑨假“就”为“戚”。《汗简》走部也有遯字,注“戚”古文,也是假“就”为之。又郭店楚简遯字变体作邇,《六德》:“新邇远近”(简48),读为“亲戚远近”。^⑩正始三体石经《春秋》文公元年“公孙敖会晋侯于戚”,戚字作邇,与邇乃一字异构。均假“就”为“戚”。

从望山楚简遯(就)字的用法来看,当训为“终”,义同迄。

1998年10月草于香江

注释:

①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望山楚简》,中华书局1995年版。以下简称《望山》。

②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以下简称《包山》。

③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以下简称《郭店》。

④参看吴振武《古筮和秦简中的“穆”字》,《文史》第38辑。

⑤《释羣》,收入《朱德熙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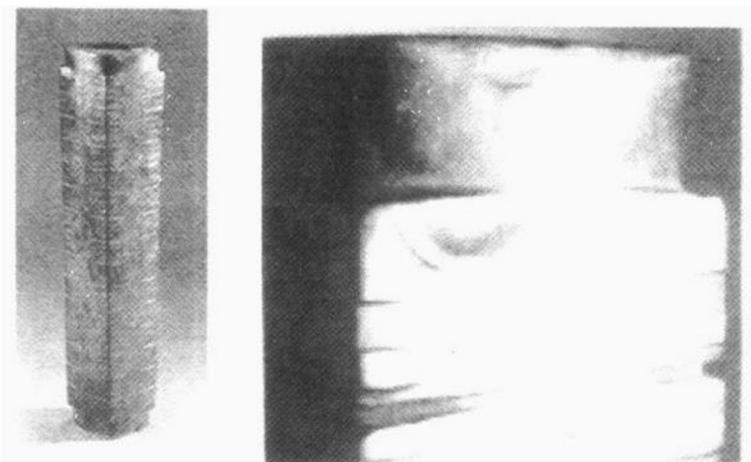
⑥王人聪:《西周金文“肅羣”一词补释》,《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2期。

⑦⑧同注③释文注释。

占和口的新试读 ——太平洋两岸古祭祀符号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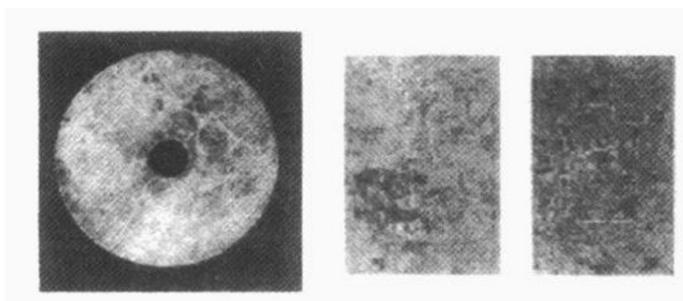
[美]许 辉

1974年,唐兰先生试读大汶口陶器上的占^①为从日从火的文字之后^②,良渚玉琮(见图一)和玉璧上又发现了口刻划符号。



图一 良渚玉琮

良渚玉琮^③上方有一鸟,立于一神柱(竹灵神树?),下有凸形(坛形),内有另一鸟(张翅欲飞状)。良渚另一玉璧^④也有同类的刻符,占与坛形(坛形内也有一飞鸟状)分别刻在玉璧的正反两面的外缘(见图二)。



图二 良渚玉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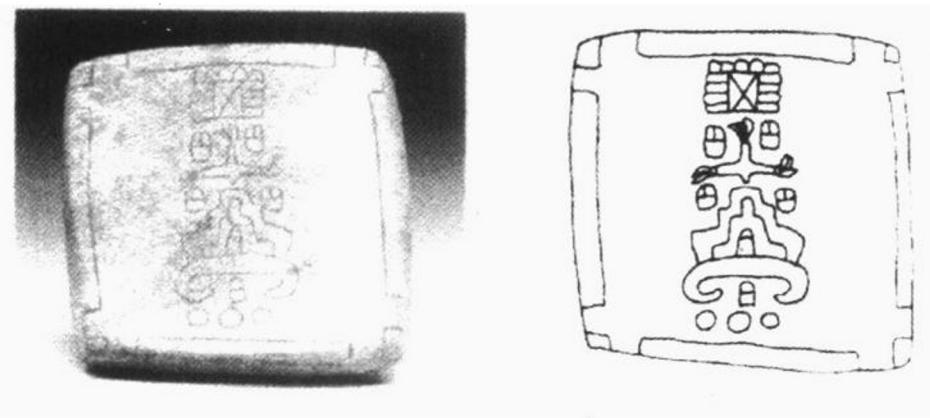
图三 良渚玉璧符号(美藏)

另外,美国华盛顿史密斯国家博物馆弗利尔美术馆收藏的一件良渚玉璧(见图三)及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另一种良渚玉琮都刻有相似符号。这些符号都是刻划在琮璧上,而中国古代的琮璧均为先人礼天地的器物,是“天地贯通”的象征和法器⁵(按照林已奈夫的说法),是降神时神所依凭的“主”。琮璧上的刻划符号似乎都有一种宗教涵义。

李学勤先生曾试读⁶为鸟字,即鸟侧立于山上之形⁶。从“鸟”字到“灵”字,李先生还曾联想到《尚书》里提到的“岛夷”,即古代滨海的部族。有其他的学者指出该符号可能与氏族族徽有关⁷。林已奈夫先生曾经解释过,从大汶口到良渚古符号的流通来看,公元前3000年时南北氏族神灵交流广泛,文字性质明显⁸。1997年10月在香港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研讨会上,李先生再次提出关于鸟字的新见解,敦促学者们集思广益,深入探讨古文字符号的涵义。

无独有偶,在太平洋彼岸史前考古的发现中,曾经在墨西哥格雷罗出土过一块正方形(长、宽8.9厘米,厚1.9厘米)玉板⁹,玉板(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800年)现存美国达拉斯美术馆。中美洲专家们曾经怀疑玉块上的刻符是否奥尔梅克文明的早期文字。因为没能找到刻符的语音元素,所以文字一说被否决,但是玉板的宗教意义及宇宙观非常引人注目。

格雷罗玉板上也刻有与祭祀有关的符号(见图四)。玉板的正中刻有一鸟(张翅欲飞状),鸟羽四周刻有四个¹⁰形(雷雨状),下有一座¹¹神坛(双线立体状),神坛下是祭祖神灵符号。而飞鸟上方的¹²形则表示皇冠或天国。玉板外围有一¹³形符号。玉板刻符均涂有朱砂,可见这块玉板非常重要,有祭祀神灵作用。达拉斯美术馆的说明也提到该玉板可能是埋藏在奥尔梅克文化祭祀中心下面的信物。



图四 格雷罗玉板

特别应该引起重视的是玉板上的飞鸟和神坛符号与良渚玉琮和玉璧上的⁶形巧合。我们可以受到启示,良渚的⁶也是祭祀祖先神灵的符号。再则,玉板上代表了神坛的¹¹与商代甲骨及青铜铭刻上的¹³字一致(见图五)。

而在上述玉板发掘区的查卡金葛曾经出土过另一块神坛大石碑¹⁰。石碑本身就是一个俯视的浮雕亚字神坛(见图六)。

神坛大石碑系花岗岩石所打制,呈现一幅瞪眼、皱眉、大口的怪兽图。最引人注目的是中间的亚形大口,周围还有三圈亚形状,四周插有类似神树的手足。